

# 唯冠吃“苹果”的市场启示

“常回家看看”这样的道德规范入法,是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有利于弘扬中国传统孝道文化。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时,多名委员、代表阐释了上述观点。(7月1日《新京报》)

## 公务接待立即不吃鱼翅又能如何

2011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丁国联合30多位人大代表提出建议,要求制定禁止公务和官方宴请消费鱼翅规定。7月2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政策法规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已正式发函给丁国,并表示有望在三年内发文规定公务接待不得食用鱼翅。(7月3日《重庆华龙网》)

什么人在消费鱼翅呢?除了少数喜欢奢侈的富人之外,无非是公款吃喝的官员群体。公款吃喝浪费严重、行政成本居高不下,已经成为屡禁不止的痼疾。花公家的钱不心疼,再荒诞的涨价理由也能理直气壮,再贵的茅台酒照喝不误,再贵的鱼翅也照吃不误。但如果公款消费能得到有效管控,肯定会大大降低鱼翅消费,从而对保护海洋生态平衡产生促进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立法禁止公务接待食用鱼翅的思路是可行的。

从民意期待上看,社会自然恨不能有关部门立即出台“鱼翅禁令”;但从制度效果上看,现在出台或者是三年后出台,意义并不大。毕竟,禁止鱼翅贸易是一项社会性乃至世界性的人文命题,不是公务接待吃不吃鱼翅那么简单——公务接待不吃鱼翅可以在非公务接待的场合吃,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事儿多了去了——我们真正关注的其实不是官员吃了多少鱼翅,而是如何降低公务消费。

公款吃喝已成过街老鼠。为剿杀这一行政痼疾,建言献策者不计其数,“立法禁止消费××”就是其中之一。此番人大代表建议禁止公务接待不吃鱼翅,与前一段时间的立法禁止公款消费茅台酒基本类似。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公款接待不食用鱼翅,不喝茅台酒与遏制公款吃喝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不买茅台酒可以买五粮液,不让吃鱼翅可以吃“山珍”,只要有“需求”存在,任何奢侈品走入公务接待名单都有可能。那么,我们总不能不断地跟在后面忙着进行“立法禁止”。

很显然,试图通过禁止消费什么来降低腐败和公款吃喝是徒劳无功的,与其禁止吃鱼翅喝茅台,不如管管公款吃喝的人。只要管住了公款吃喝的人,降低了公款吃喝费用,“公务接待的鱼翅问题”不攻自破。然而,从现实的情况来看,似乎管住公款吃喝的人远远比立法禁止公务接待吃鱼翅更难,所以才退而求其次。这当真是一个非常吊诡的问题:管不住公款吃喝的人,出台再严厉的禁令又能如何呢? 陈一舟

唯冠和苹果的官司打得热闹,围观者众。原因在于双方力量的严重不对称,一个是濒临破产的中国小公司,一个是全球IT产业的美国大公司。这场不对称的知识产权战,就像老鼠战大象,老鼠掐住了大象的死穴,狠狠地教训了大象一把。

苹果与深圳唯冠的iPad商标案最终得到圆满解决,苹果支付6000万美元一揽子解决iPad商标纠纷。(7月2日《新闻晚报》)

利益纠葛和权利纠纷,就是平等的市场契约主体。谈不拢就法庭裁决,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最常识的维权手段。故而,唯冠的维权就是一场正常的知识产权官司。无论谁大谁小谁弱谁强,存在利

苹果不管有何功利目的,都有着法治上的理性。

苹果愿意付出6000万美元予以和解,可见其胜诉的底气不足。这或许源于其损害了唯冠品牌的知识产权,或是因为技术操作上的疏忽所致。但不管是哪一种,苹果为其市场瑕疵埋单都是天经地义。

如果没有这场官司,国人或许根本不晓得唯冠是何方神圣。但唯冠给予中国市场的意义不是这场官司带来的名利双收,而是市场和法治的双重启蒙——市场博弈,不分大小,只讲权利平等;敢打官司,法治维权。而这,恰恰是国人极稀缺的品质。张敬伟

## 新财路

身份证被人冒用来办信用卡恶意透支、办电话卡狂打电话欠下巨额费用……近年来,身份证被冒用的现象越来越多。记者在网上一搜“身份证收购”几个字,立即搜索到了不少相关内容。记者注意到,有不少网页、论坛上都有收购者以不同理由收购身份证,有的说是网吧,给未成年学生上网用,有的说是申请网络实名交易平台账户,也有人说是用来开公司进行诈骗的。 焦海洋/图



## “编制”之痛何时止

据媒体报道,湖北某市教育局违规挪用其下属单位的事业编制,导致大量人员超编,23人的行政编制数,实际工作人员多达71人。更有甚者,一些退居二线的官员占着编制却不上班,工资一分不少,享受各种津贴,有“吃空饷”之嫌。

据媒体报道,湖北某市教育局违规挪用其下属单位的事业编制,导致大量人员超编,23人的行政编制数,实际工作人员多达71人。更有甚者,一些退居二线的官员占着编制却不上班,工资一分不少,享受各种津贴,有“吃空饷”之嫌。

据媒体报道,湖北某市教育局违规挪用其下属单位的事业编制,导致大量人员超编,23人的行政编制数,实际工作人员多达71人。更有甚者,一些退居二线的官员占着编制却不上班,工资一分不少,享受各种津贴,有“吃空饷”之嫌。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不少地方的中小学、特别是基层中小学,教师缺编现象十分严重,不得不大量聘请代课教师,临时教师。这群特殊的教师没有医保、缺少培训、收入微薄,为教育事业默默奉献,却常年看不到转正的希望。缺编,已然已成为制约我国

教育水平提高的重要原因之一。刺眼的对比,凸显出教育领域内的“编制”之痛。网上曾经有一个帖子如此发问:“试问,有多少占据人民教师编制的人,却从未真正走上三尺讲台?”

据媒体报道,湖北某市教育局违规挪用其下属单位的事业编制,导致大量人员超编,23人的行政编制数,实际工作人员多达71人。更有甚者,一些退居二线的官员占着编制却不上班,工资一分不少,享受各种津贴,有“吃空饷”之嫌。

## 延迟退休还要试探多少次

是否延迟退休,何时延迟退休,延迟退休需要准备什么样的前提,不该是某个部门说了算,更不是几个专家说了算,而要问一问汹涌而广泛的民意。

日前在北京召开的一个关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研讨会上,人社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何平发言惹人关注。他建议中国从2016年实行延长退休年龄的政策,并每两年延长1岁退休年龄,到2045年不论男女退休年龄均为65岁。

延迟退休话题再次被热议。上个月中旬,人社部提出将适时推出弹性延迟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的政策,最早将在今年下半年启动调研。消息立即引起了舆论的剧烈反弹,晶报也密集地推出了多篇社论,就公众关心的养老金缺口问题及其账户信息公开问题、养老金双轨制问题等进行了尖锐质疑。但是,公众的重大关切至今没有得到人社部的正面回应。

这种情况下,人社部专家急忙抛出“男女65岁退休”论,只能进一步加剧公众的不安与不信任情绪。这不仅仅在于专家的发言里完全回避了养老金改革的核心问题,找不到关于公平、关于社会责任的字眼,却大谈什么加强对老年人培训的内容,也在该专家作为人社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特殊身份让人疑惑——他到底是代表谁而发声?

虽然,延迟退休的公共话题,谁都有资格发表意见。如果是一名纯粹的专业研究者,可以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提出判断与看法,公众也有理由将其看成是可以辩论的一家之言;如果是人社部的新闻发言人、代表政府部门的立场与权威回应,也可以让公众清楚地知道政策的底线与边界所在。但是,“人社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这种半官方、半学者的身份,只能让公众的感受变得更加云山雾罩,对政策的走向大猜谜语。

联想到不久前,针对公众几乎是一边倒的反对声音,人社部有关负责人不得不站出来表示,的确在对“延迟退休年龄”展开研究,但像一些媒体所说的“退休年龄提高至65岁甚至更晚”,不会在近期立刻实施。话音刚落,就有人社部专家恰到好处地提出65岁退休的建议,令人不得不产生这样的揣测:倘若说延迟退休问题越来越像一项压力测试,莫非专家也是这项测试中的一环,承担着试探民意的任务?

公众一直希望人社部能正面回应关于养老金的疑惑,给出养老金改革的详细方案与时间表,但是,人社部对此采取了选择性失聪。而在这次研讨会上,多位专家提出或附和65岁退休的建议,也是避重就轻,避实就虚,专家的公信力恐怕因此大打折扣——事实上,早在2010年,上海交大一位管理学院院长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我国现行退休年龄太早,大多数人会愿意延长退休年龄。不知该专家看到日前公布的一项九成多人反对延迟退休的调查结果,心中会作何感想。

与其说这是学术水平问题,不如说涉及学术独立与学术良知的问题,但归根结底,还是这背后的利益纠缠和制度缺陷问题。延迟退休也许会增加多少弥补缺口,但远远不能弥补由此向整个社会溢出的成本。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一定要代表最广泛的公共利益。所以,是否延迟退休,何时延迟退休,延迟退休需要准备什么样的前提,不该是某个部门说了算,更不是几个专家说了算,而要问一问汹涌而广泛的民意——这里面也包括一些中肯的专业声音。只有这样,养老金改革才能承担起更多的公平正义。 晶文

## 住房空置率到底有多少

作为衡量房地产市场以及经济发展健康状况的一项重要指标,定期公布住房空置率早已成为不少国家的通行做法。但是,尽管社会公众的呼吁之声此起彼伏,各地的相关住房空置率却始终成为“难解之谜”,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众所周知,住房空置率不仅可以显示真实的购房需求和社会财富分配状况,也是衡量房地产市场泡沫程度的核心指标,是国家调控政策的重要依据。摸清住房空置状况,维护市场信息公开透明,是政府部门的应尽职责。对数据回避、缄默,对民意置若罔闻,是取能的缺位,也是对政府公信力的损害。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房地产市场已进入关键时期。近期个别城市住房交易价格、交易量止跌回升,一些地方政策“曲线救市”,无疑都使中央此轮调控政策面临严峻考验。及时摸清并公布住房空置情况,不但可以赢得更多民意支持,更能准确把握调控效果,为未来的调控政策储备提供现实基础。

五花八门、似是而非的空置率“猜想”,不断加重着公众焦虑。有关高校的课题数据,国家统计局“零电表”调查,以及民间的网“数黑头”……不同版本的住房空置率一次次激起人们的强烈关注。近来又有报道称北京空置房有381万多户,但负责调查的公安机关又解释称是最后数据。如此不断揭开并不断否定,让真实的空置率更加扑朔迷离。

事实上,人们清楚地看到,从技术层面讲,比较完善的定义和调查操作办法早有经验可鉴,并不足以成为当前住房空置率“隐身”的托辞。

其实,住房空置率数据只是楼市数据成谜的一个缩影。作为房产税、物业税等政策依据的关键数据,人均房屋套数、人均住房面积等至今在百姓心中仍是笔“糊涂账”。加快信息联网,尽快公布真实数据,是政府责任的体现,更是保证房地产市场调控不失灵、保证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 张迪

事实上,人们清楚地看到,从技术层面讲,比较完善的定义和调查操作办法早有经验可鉴,并不足以成为当前住房空置率“隐身”的托辞。

事实上,人们清楚地看到,从技术层面讲,比较完善的定义和调查操作办法早有经验可鉴,并不足以成为当前住房空置率“隐身”的托辞。

其实,住房空置率数据只是楼市数据成谜的一个缩影。作为房产税、物业税等政策依据的关键数据,人均房屋套数、人均住房面积等至今在百姓心中仍是笔“糊涂账”。加快信息联网,尽快公布真实数据,是政府责任的体现,更是保证房地产市场调控不失灵、保证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 张迪

事实上,人们清楚地看到,从技术层面讲,比较完善的定义和调查操作办法早有经验可鉴,并不足以成为当前住房空置率“隐身”的托辞。

事实上,人们清楚地看到,从技术层面讲,比较完善的定义和调查操作办法早有经验可鉴,并不足以成为当前住房空置率“隐身”的托辞。

其实,住房空置率数据只是楼市数据成谜的一个缩影。作为房产税、物业税等政策依据的关键数据,人均房屋套数、人均住房面积等至今在百姓心中仍是笔“糊涂账”。加快信息联网,尽快公布真实数据,是政府责任的体现,更是保证房地产市场调控不失灵、保证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 张迪

事实上,人们清楚地看到,从技术层面讲,比较完善的定义和调查操作办法早有经验可鉴,并不足以成为当前住房空置率“隐身”的托辞。

事实上,人们清楚地看到,从技术层面讲,比较完善的定义和调查操作办法早有经验可鉴,并不足以成为当前住房空置率“隐身”的托辞。

其实,住房空置率数据只是楼市数据成谜的一个缩影。作为房产税、物业税等政策依据的关键数据,人均房屋套数、人均住房面积等至今在百姓心中仍是笔“糊涂账”。加快信息联网,尽快公布真实数据,是政府责任的体现,更是保证房地产市场调控不失灵、保证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 张迪

事实上,人们清楚地看到,从技术层面讲,比较完善的定义和调查操作办法早有经验可鉴,并不足以成为当前住房空置率“隐身”的托辞。

事实上,人们清楚地看到,从技术层面讲,比较完善的定义和调查操作办法早有经验可鉴,并不足以成为当前住房空置率“隐身”的托辞。

今年4月,温州出台公务用车改革新政,因正处级每月交通费补贴3100元等因素,被外界称为“三高车改”;涉改车辆比例最高,保留专车的干部级别最高,车改后的补贴最高。(7月2日《新京报》)

“三高”中最值得关注的其实还是车改补贴。温州作为一个地级市,正处级的车补不仅超过其他地区同级,竟然还超过杭州的正局级许多,这难免给人过高之感。“一高”之外还有“一低”,温州这次拍卖的215辆公车,平均起拍价3万元,平均成交价5万元;最低的一辆车只有5000元,最高的一辆越野车也只不过卖了17万元。价格竟然这么低,也难怪网上嘘声一片。

公车的泛滥,不仅耗费了公帑,而且承载了助长了太多官场不正之风。而推行公车改革,既能节省财政支出,又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官本位。车改的可贵在于,它是掌权者“向自己开刀”;难就难在,它涉及相当一部分人的利益。有改革就有反改革,如果车改绕过利益走,维护甚至增加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那这样的车改,就很难让人们放心。

3100元的车补,已经超出一些人的月薪。正如全国人大代表叶青质疑的,温州这个补贴标准是如何制定出来的?人们不能不问,这到底是改革,还是借车改谋取二次利益?“一高”,把补贴定得高高的,官员的利益丝毫不受损失;“一低”,拍卖价格超低,官员获得的好处实实在在。这样的车改,想必阻力很小,可又有何意义?一些地方车改出现的“补贴照领、公车照坐”现象,谁也不能保证不会继续出现,这意味着到最后可能连节省财政支出都得打水漂。 毛建国

差距、合理引导消费的国际通行做法。但这又恰恰将国人的购买力推向了奢侈品享受免税,具有低价值优势的境外市场。不妨考虑通过一定的渠道和方法吸引国内和境外游客在国内购买奢侈品,这样有利于扩大消费,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对于奢侈品消费,还需打击“猫腻”——加大力度惩治腐败,最大程度减少公款奢侈品消费。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我们的周围有越来越多的人摒弃了通过外在包装来证明自己财富和地位的做法,消费正向着理性、时尚、舒适、得体 and 实用的方向发展。相信不久的将来,巴黎老佛爷百货和东京银座三越百货的店员对中国游客鞠躬欢迎时,会越来越多地出于内心的感谢和尊敬。 李倩

## 「常回家看看」的孝道不能混淆于法

本土的人口愈来愈老龄化,无疑,这种倾向的继续和发展将对社会和个人产生深远的影响。作为亚文化群的老年人,他们有着自己感知世界的方式和生活方式。随着与其他年龄群体的慢慢分离,老年人需要更多的子女的生活关照和精神慰藉。这种孝敬具体到子女的个人身上,可概括为孝道。孝道,是为子之道。孝道,在任何社会条件下都有积极价值。“善事父母为孝”。“孝”字,是由“老”字省去右下角的形体,和“子”字组合而成的一个会意字。从中可以看出,“孝”的文字字形与“善事父母”之义是吻合的。一个没有孝道的人,在社会上是站不住脚的。道理很简单,一个人对自己父母都不好,会对别人好吗?从伦理学的意义上讲,这种人不可交也不可信任。

孝道,是晚辈对长辈的一种善行和美德。现在的孝子,已很难做到“父母在,不远游”了,但“常回家看看”,对守在父母近旁的孝子们来说,却是一种可行的孝道。多位委员、代表建议将“常回家看看”条款入法,其良苦用心、良好用意不言自明。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赡养人,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百善孝为先”,“百行孝为先”,这些至理名言都是人类珍贵的伦理资源,都是家庭中晚辈在处理与长辈的关系时应具有的基本道德品质。没有父母就没有子女的一切。作为人,就该对父母感恩,恪守孝道。

应当说,多位委员、代表建议将“常回家看看”条款入法,只能是代表个人至多是部分人的一个观点。他们大概尚未弄清道德与法律的界限。法律是以道德作为价值基础的,但道德与法律还不是一回事。“法律规范的结构是假定、处理和制裁或者说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而道德通常是潜移默化的,道德规范并没有具体的制裁措施或者法律后果”。也就是说,建议“常回家看看”条款入法,是脱离现实状况,把道德问题混淆于法律问题,因而,它不具备可诉性,亦即不具备可操作性。

人人都会年轻,也都会变老。从根本上说,孝敬老人是做人的德行而不是在守法。法律是威严的神圣的,但对人类的尊严而言,法律上还有更高的准则。即便退回到形而下的层面,作为人子,谁不挂念父母?谁不珍惜膝下尽孝?谁不愿意享受天伦之乐,常与家人团聚?“常回家看看”不是需要用法律管住的例行公事,孝道贵在心中,拿一道法律条款框住孝心,不会起到尽善尽美的效果。

不把道德问题法律化,不是不要孝道。孝道无非就是孝子践行孝心,世间从不乏孝道。一般而言,子女生活得好,自然会多多地孝敬父母。反之,他们本身即过得焦头烂额,孝行亦可能会减弱。从这个意义上说,孝道也是个社会问题。日月流转,春秋序替。老年作为一个明显的生命阶段,无法避免。多数老人,不需要法律引导他们的孝道,他们会用尊敬赡养父母,让老人的日子过得更好。同时,孝道需要社会条件,社会繁荣了、和谐了、安宁了,人们珍视老年人的经验,孝道才会大行其道。 今语

## 三千一百元车补如何确定的

今年4月,温州出台公务用车改革新政,因正处级每月交通费补贴3100元等因素,被外界称为“三高车改”;涉改车辆比例最高,保留专车的干部级别最高,车改后的补贴最高。(7月2日《新京报》)

“三高”中最值得关注的其实还是车改补贴。温州作为一个地级市,正处级的车补不仅超过其他地区同级,竟然还超过杭州的正局级许多,这难免给人过高之感。“一高”之外还有“一低”,温州这次拍卖的215辆公车,平均起拍价3万元,平均成交价5万元;最低的一辆车只有5000元,最高的一辆越野车也只不过卖了17万元。价格竟然这么低,也难怪网上嘘声一片。

公车的泛滥,不仅耗费了公帑,而且承载了助长了太多官场不正之风。而推行公车改革,既能节省财政支出,又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官本位。车改的可贵在于,它是掌权者“向自己开刀”;难就难在,它涉及相当一部分人的利益。有改革就有反改革,如果车改绕过利益走,维护甚至增加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那这样的车改,就很难让人们放心。

3100元的车补,已经超出一些人的月薪。正如全国人大代表叶青质疑的,温州这个补贴标准是如何制定出来的?人们不能不问,这到底是改革,还是借车改谋取二次利益?“一高”,把补贴定得高高的,官员的利益丝毫不受损失;“一低”,拍卖价格超低,官员获得的好处实实在在。这样的车改,想必阻力很小,可又有何意义?一些地方车改出现的“补贴照领、公车照坐”现象,谁也不能保证不会继续出现,这意味着到最后可能连节省财政支出都得打水漂。 毛建国

差距、合理引导消费的国际通行做法。但这又恰恰将国人的购买力推向了奢侈品享受免税,具有低价值优势的境外市场。不妨考虑通过一定的渠道和方法吸引国内和境外游客在国内购买奢侈品,这样有利于扩大消费,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对于奢侈品消费,还需打击“猫腻”——加大力度惩治腐败,最大程度减少公款奢侈品消费。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我们的周围有越来越多的人摒弃了通过外在包装来证明自己财富和地位的做法,消费正向着理性、时尚、舒适、得体 and 实用的方向发展。相信不久的将来,巴黎老佛爷百货和东京银座三越百货的店员对中国游客鞠躬欢迎时,会越来越多地出于内心的感谢和尊敬。 李倩

## 为啥都爱买“LV”

时下,国人对于奢侈品的巨大需求让外国人瞠目结舌。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LV店铺前,众多中国游客不惜花费数小时宝贵的观光时间用于排队,进店后甚至连价格都不问就会买下若干价值不菲的包包,绝不空手而归。在北京,刚刚结束的奢侈品展览意向成交额高达6.7亿元,92%的参展商预定了明年的展位。“中国将是全球奢侈品消费增长最快的市场”已成为业内专家的共识。有人预计到2015年,中国将占全球奢侈品市场20%以上的份额。

奢侈品是那些超出人们普通生存需要范围,独特稀缺、珍奇珍贵和精美绝伦的顶级品牌消费品。因此,国外的奢侈品爱好者、收藏家往往是上了岁数的有钱人。奢侈品大多是富有文化内涵的产品,

拥有奢侈品也就意味着拥有一种文化。而在国内,奢侈品消费群体却往往是三类人:炫耀财富、显示身份的富人,崇拜名牌、获取满足的年轻人,还有用来社交“勾兑”和商业“潜规则”的送礼者。

回头再看我们办公室里女士们的穿戴,背名牌包的大多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甚至有20多岁刚毕业的大学生。卡地亚手镯、LV袋子、Dior太阳镜、Tiffany项链、Ferragamo鞋子……见过的、没见过的,应有尽有,有个大姐用的是法国兰蔻护肤品,居然被她们称之为低端。

奢侈品是那些超出人们普通生存需要范围,独特稀缺、珍奇珍贵和精美绝伦的顶级品牌消费品。因此,国外的奢侈品爱好者、收藏家往往是上了岁数的有钱人。奢侈品大多是富有文化内涵的产品,

拥有奢侈品也就意味着拥有一种文化。而在国内,奢侈品消费群体却往往是三类人:炫耀财富、显示身份的富人,崇拜名牌、获取满足的年轻人,还有用来社交“勾兑”和商业“潜规则”的送礼者。